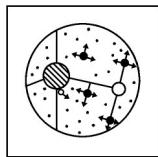


# 城市要素下乡与乡村治理变迁\*

## ——乡村振兴的路径之辩

施德浩 陈浩 于涛



**提要** 城市要素下乡不但是对乡村要素流失的经济反哺，更是整治乡土社会，重塑乡村治理的政治反哺。首先，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历程，并引出当前长三角地区资本和精英要素下乡反哺乡土社会，重塑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接着，选取了典型乡村进行长期田野观察，实证剖析两种城市要素下乡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发现：资本下乡引起消费符号生产，构建以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城市游客为主体的乡村政企合作模式；精英下乡引导村民教育赋权，整合乡镇政府、社会精英和本土村民形成乡村社区自治模式。进而，对比了两种治理模式下的乡村发展路径差异：资本下乡推动大山村农业多元化、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空间美化；精英下乡引导陈庄农业产业化、农民技能培训、农村功能改善。最后，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城市要素下乡的格局猜想和价值反思。

**关键词** 乡村治理；资本下乡；精英下乡；乡村发展路径

Urban Resource Flow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hanges of Rural Governance—Debate on the Paths of Rural Vitalization

SHI Dehao, CHEN Hao, YU Tao

**Abstract:** The influx of urban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compensation to the villages but also a force to rectify rural society and reshape rural governance.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change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introduces the new model in which capital and the elite help re-nourish the rural society and reshape the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then selects typical villages and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wo urban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capital inflow to the countryside causes modern symbol embedding and builds a rural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ve model involv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urban tourists as the main play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lite inflows to the countryside helps improve local educate, and foster a model of rural community autonomy by mobiliz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elites and local villager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 paths under the two governance models are also compared. While capital inflow to Dashan Village promotes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increases farmers' income, and expedites rural beautification, elites inflows to Chenzhuang promote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farmers' skills training, and rural functional improvement.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prospect and benefits of urban factor inflow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elit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development path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90601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9)06-0107-07

### 作者简介

施德浩，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sdhdouble@foxmail.com

陈浩，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于涛，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通讯作者，taoyu@nju.edu.cn

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是“乡土社会中人可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了‘需要’，因而有了‘计划’”（费孝通，1985）。近年来，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战略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从乡土社会过渡至现代社会，代表“计划”的乡村规划与治理即成了基本要求和必经之途（张尚武，等，2014）。乡村治理研究历来是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已有丰富的成果阐述了两之间互赖互促的理论关系（贺雪峰，董磊明，2005；党国英，2008；张京祥，等，2014；刘金海，2016）。然而现有研究多着眼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现实挑战和问题，多从规范性和理论性角度探讨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对一些地区涌现的乡村治理实践缺乏过程性的实证辨析。

\* 本文根据“第四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获奖论文改写而成

## 1 资本下乡与精英下乡：乡村治理模式之变

治理源于西方公共管理领域，强调个人与组织、官方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The UN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对其的探索实践由来已久。历史上国家无法构建出延伸至乡一级的庞大官僚体系，汲取乡村赋税、稳定乡村社会、维护政权基层合法性等需求主要依托乡里制度、宗族、乡绅等来实现，因此，形成了“皇权不下乡，乡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格局，这是乡绅精英和宗族领衔的乡村自治模式（何建华，于建嵘，2005）。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首次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乡村社会高度整合到人民公社，形成了“国家权力屏蔽地方权力，国家全能治理屏蔽地方自治”的乡村国治模式（邹谠，1994），这一时期乡村自治力量几乎被湮灭。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国家基层政权退回乡镇一级，基层自治力量重新出现，表现为科层体制下，乡镇政府主导、村自治组织落实的乡政村治模式（金太军，2000；徐勇，2003）。但是此时乡村自治力量已经难以恢复过去的治理能力，乡土社会呈现出明显的离散化和原子化特征。本世纪初国家提出的农村税费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尝试不但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经济反哺，更是整治无序的乡土社会，重构乡村治理模式的政治反哺。然而单凭国家已经难以锻造出乡村基层的善治（陈锋，2015），因此中央开始推行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鼓励资本下乡等一系列政策<sup>①</sup>，引导企业资本、知识分子、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建设活动，原本国家权力和自治力量的拉锯转变为多方主体的合作、竞争与博弈，衍生出各种超越传统逻辑的乡村治理新模式（贺雪峰，董磊明，2005；邹艳丽，2015；吴祖泉，2015；乔杰，洪亮平，2017）。

长三角地区处于我国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沿，近年来该地区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全国的乡村振兴实践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范凌云，2015；武前波，等，2017）。依托活跃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社会网络，企业资本、社会精英、高校科研单位等多元力量纷纷介入乡村发展建设实践，形成了两种比较典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即资本下乡所形成的“资本主导型”（温铁军，2005；施雪华，林畅，2008）与精英下乡所形成“精英主导型”（贺雪峰，2013；黄博，刘祖云，2013）。这两种类型实践正深刻重塑着该地区的乡村面貌：资本结合地方权力，形成了沿袭城市治理逻辑，以经济增长、村民增收为目标，地方政府搭台、社会企业唱戏的乡村政企合作模式；而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等人才下乡运用先进的治理理念和科学技术推动乡村营建，他们深入基层，根植乡土，与村民、地方力量组成乡村社区自治模式。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sup>②</sup>，明确提出“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和“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战略举措。资本和精英等城市要素逐渐向乡村流动的呼吁由来已久（王曙光，2016；焦长权，周飞舟，2016），然而当前少有研究深入对比实证这两种治理模式的实际运行过程、效果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分别选择两种模式的典型案例——资本下乡的大山村、精英下乡的陈庄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对比两种乡村治理逻辑和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剖析乡村传统三要素——农业、村民、村庄的发展路径实证两种模式的运行效果、问题，以期反思过往有关规范性研究所形成的认识，并反馈和改进两种乡村治理模式。

## 2 符号生产与教育赋权：两种乡村治理模式的逻辑与结构

本文实证对象是南京高淳大山村和句容茅山陈庄。区位上，两村分别位于南京高淳区和镇江句容市，同属南京市都市圈，距离南京市均为一小时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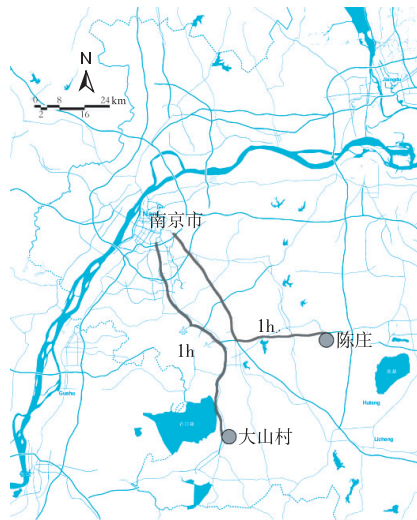


图1 两村空间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Dashan village and Chen-zhuang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图1）。历史上，句容与高淳同属于旧金陵府，1950年代，由于行政因素将隶属于南京的句容划入镇江市，而句容建城近两千年，一直作为金陵府的老八县之一，划入镇江不过七十年，因此，高淳大山村与句容陈庄仍然保持着相同的风俗习惯。两村地理同区、文化同源、村民同根，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提出和企业资本、社会精英进入之前，两个村庄都出现了明显的衰败倾向。

### 2.1 大山村：外源于符号生产的乡村政企合作

高淳区位于南京市南部，是南京都市圈边缘的优质生态空间。作为桤溪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大山村原有村民203户，共计532人，并呈现出交通闭塞、耕地贫瘠、设施落后的衰败景象（张京祥，等，2015）。2010年以来“国际慢城”等各项荣誉的赋予，短期内激化各类资源要素向大山村富集：一方面开展乡村旅游并引入社会资本带动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获取上级政府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美化村庄环境。通过符号生产吸引游客消费、旅游发展推动农业升级、产业转型提升村民收入这一增长逻辑来不断加速其乡村发展建设速度，实现短期在经济总量、劳动力结构、乡村建成环境等方面的激变（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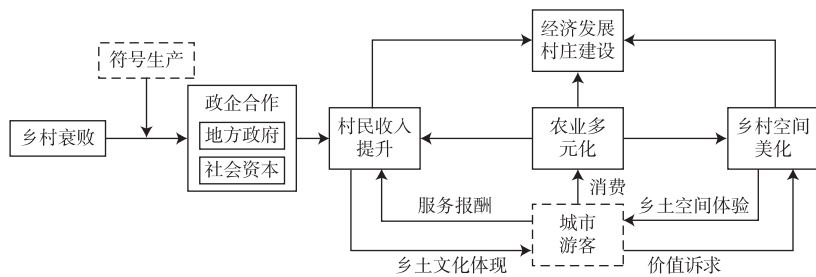


图2 符号生产：大山村治理逻辑  
Fig.2 Symbol embedding: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of Dash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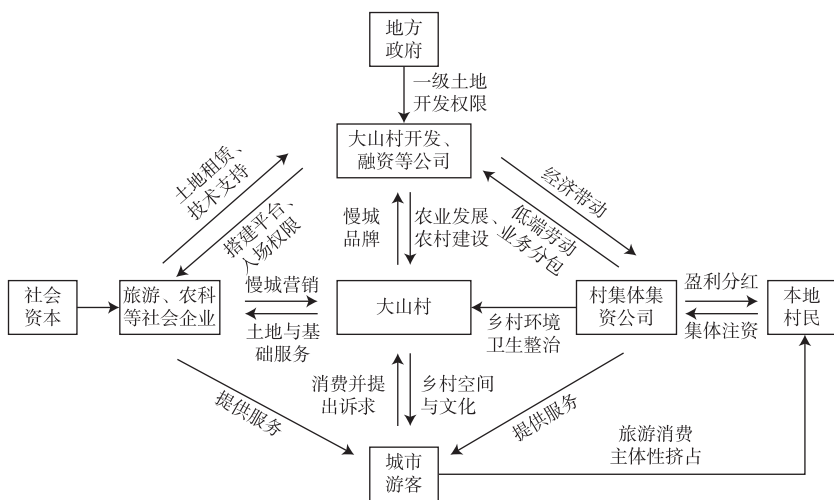


图3 政企合作：大山村治理结构  
Fig.3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ash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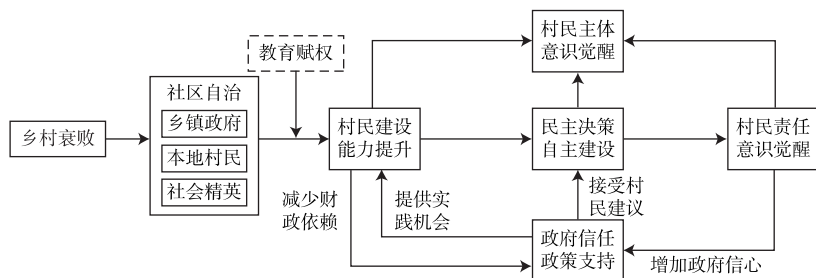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赋权：陈庄村治理逻辑  
Fig.4 Education empowerment: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of Chenzhuang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2.1.1 地方政府：迎合符号落地的“七通一平”

过去大山村主要依靠传统的旅游农家乐与周边村庄进行低端同质化竞争。符号嵌入后，地方政府凭借一级土地开发权限，协同镇、村两级政府搭建开发融资平台开展企业化运营，这些平台为社会资本提供入场权限，为村集体集资公司提供项目分包，成为大山村开发建设经济纽带。此外，地方政府通过财

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沥青马路、乡村公厕、垃圾回收设施等，同时开展一系列乡村符号化建设<sup>③</sup>，如在所有公共设施上张贴logo标识以倡导“慢生活”理念；限制汽车的使用和行使速度等，为乡村品牌宣传和特色产业入驻进行“七通一平”。

### 2.1.2 社会资本：挖掘符号价值的事件营销

榉溪镇政府和 大山村村集体搭建平

台后，各类企业积极跟进并带入社会资本和产业技术。一方面可观的土地租赁和管理费用为大山村快速建设提供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撑，改善村庄建设环境和村民人均收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市场化的运行手段充分挖掘了大山村的“国际慢城”符号的营销价值，通过官方媒体、广告宣传等方式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力。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结成乡村“增长联盟”，利用乡村的“大事件营销”效应（于涛，等，2011），通过超规模、高密度的投资与建设活动形成乡村激变动力。

### 2.1.3 城市游客：消费符号文化到“顾客至上”

大山村原始的乡村生态景观和植入的符号文化体验对久居都市、远离自然的城市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怀揣着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的向往，裹挟着对乡土体验、文化消费的追求，成为大山村符号的主要消费群体。城市游客的消费主义和政企联盟的逐利诉求进行乡村建设主体的二次遴选，从原先传统式的“村民本位”嬗变成企业化的“顾客至上”，本土村民的主体性在大山村急速发展过程中让位于游客，由此形成了大山村政企合作的治理模式（图3）。

### 2.2 陈庄村：内生于教育赋权的乡村社区自治

陈庄村是句容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李塔村下属的自然村，位于茅山山脉的九龙山深处，户籍人口为267人，约40%的村民外出打工，剩余留守村民中60岁以上的比例高达39%，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凸显，社会经济情况与中国广大衰败乡村类似。该村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且由于位处水源涵养区，村庄给排水设施难以正常配置，其他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地理区位不佳、特色资源缺乏以及上级政策缺位，决定了陈庄难以模仿大山村通过吸引外生符号迅速带动乡村振兴。因此选择通过引入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等各类人才，通过教育赋权以乡村建设实践来唤醒村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村民自治凝聚集体共



识、农业教育带动经济发展、乡村建设促进生活改善的渐进式发展(图4)。

### 2.2.1 乡镇政府：上级指令与“长官”思想催生的有限赋权

陈庄村乡镇政府受上级政府委托，希望通过规划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空间建设，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上级财政扶持。乡镇政府赋予精英团队乡村营建的引导权和教育权，试图唤醒村民自发营建乡村的意识以减少财政压力，但依然保有传统的“长官”思想，并且存在迅速获取产业经济收益、乡村建设效果、社会资本投放的隐性目的。尽管乡镇政府口头支持教育赋权实践，并应允了“宽松”的实践环境，但又对“村民是否有能力引导乡村发展”存在明显的质疑，也不明确表态是否会接受村民的选择并提供经济支持，最终形成了事权下放、财权管控的有限赋权。

### 2.2.2 本地村民：谋富意识与“坐等”心理并存的思想囿固

本地村民对陈庄乡村空间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诉求，且初期对于乡村营建工作表示出较高的支持和配合，积极性较强，超过85%的村民表示“愿意配合”接受培训、进行房屋改造、垃圾分类等基础性工作，高达70%的村民也愿意学习“有机堆肥”、“生态农法”等教育课程。但是村民也存在明显的“搭便车”心理<sup>①</sup>：没有村庄建设的主体意识，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政府拨款、异地拆迁等政策来“坐等”经济援助。此外，村民还沿袭着传统观念：政府理应为村民建设基础设施并提供相应服务，而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只是为了争取个人利益。一方面希望积极学习谋求致富道路，另一方面严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零和思想，始终难以突破思想囿固。

### 2.2.3 社会精英：从规划到协调、从传达诉求到引导教育的双重转变

社会团队剖析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对于乡村改造和运营的态度，决定转变传统规划团队的工作方式。一方面，面对乡镇政府，团队决定由“规划师”向“社区营建顾问”和“协调员”转变，社会精英团队向乡镇政府积极传达村民诉求，并协调乡村政府和本土村民形成

规划方案，引导政府转变乡村快速景观城市化攫取利益的旧思路，形成以村民为本，遵循当地特点进行渐进式乡村社区营建以获取长期效益的新思路；另一方面，面对本地村民，团队从“诉求聆听、传达”向“引导教育”转变。通过主体意识培养、农业产业知识教育等方法，鼓励并陪伴村民形成乡村建设的自主意识，最终构建本地村民主体、乡镇政府主导、社会精英协调的乡村社区自治模式(图5)。

## 3 外源性推动与内生性发展：乡村三要素振兴路径对比

无论是“符号生产”的资本下乡还是“教育赋权”的精英下乡，都是城市要素外源性介入的过程。前者经历了“社会投资”——“风貌建设”——“旅游经营与收益”的外生型资本循环过程，其对村庄的影响是相对表层化与暂时性的，并未给乡村发展带来持续的内生动力，正如尼尔·史密斯(Smith, 1979)的资本运动理论所揭示的，随着物质资产老化或者市场变化，此类村庄将可能滞于资本退潮后的困境中；后者则遵循着“教育引导”——“意识觉醒”——“自主建设”的步骤，“教育”促进村民形成“意识”、培养“知识”，精英的外源性介入也随之演化为内生性根植。

乡村三大传统要素农业、农民、农村的长期衰落是我国乡村凋敝，产生“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sup>⑤</sup>。城市要素下乡的外源性性与内生性也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差异，所涉及的治理主体、相关利益诉求及其价值观也出现明显区别，因此乡村各要素的发展振兴路径也必然存在明显差异。

### 3.1 农业转型路径

#### 3.1.1 符号推动下大山村农业多元化

过去大山村主要以传统大田农业为主，种植稻谷、油菜、茶等，服务业只能基本满足村民日常需求。符号嵌入与治理模式转型后，农业运营与管理主体从农民转移到村集体成立的公司，进而由外来企业承包进行大规模开发，农业

定位从原先的保障性的转变为经营性并迅速分化出多种形态(图6)：有机稻谷、有机茶等经济作物不断出现，同时传统家庭耕作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向规模化农业生产过渡，代表大山村的经济农业迅速发展；城市游客的乡土体验诉求充分挖掘大山村旅游农业的潜力，在生产性农业受限于土地等天然要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充分利用大山村符号的眼球经济，吸引城市游客进入乡村消费，游客、政府、企业三者共同提供大山村旅游农业循环发展动力。大山村贯彻落实农业旅游的诱发性政策，成功突破落后地区的要素恶性循环，以经济农业和旅游农业为基础，衍生出生态农业、混合林业等多元农业形态。与此同时，通过重构农业业态、打造农业旅游等行为加快资源要素流向产业转型、经济增长等领域，加速资本要素回流，实现大山村产业结构转型。

#### 3.1.2 教育启迪下陈庄农业产业化

陈庄主要以水稻种植和经济林木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农业种植，产品附加值低。村民在知识和技能有限的情况下难以自发进行产业转型，因此陈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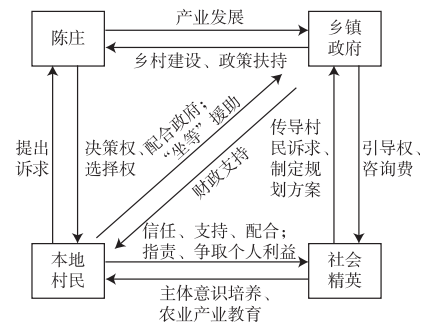


图5 社区自治：陈庄村治理结构图  
Fig.5 Community autonomy: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henzhuang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符号嵌入前后大山村农业空间变化  
Fig.6 Agricultural space changes of Dashan village before and after Symbol embedding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改绘。

希望通过培养村民自身的技能实现科学技术支撑下的农业产业化。

经过驻村精英为期3年的科普教育和实践指导,陈庄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农业全产业链。农业生产方面,运用自然农法理论<sup>⑥</sup>培训村民生态农业培育,有机农产品种植、有机肥料回收利用、微生物发酵等技能,最终在保证农业增产增收的情况下,减少农田地力损耗并改善池塘水质。农业加工环节,结合每户村民自身意愿,开展知识辅导,设置植物精华营养液制作、蔬菜采摘特色腌制等农产品加工培训课程,提高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农业销售环节,基于村民每户的农业生产规模与性质制定了两类销售方案:一部分村户参与一家一菜式合作餐饮联盟,每户负责精细制作一道农家菜,共同组建陈庄农家乐;另一部分村户负责农业观光和自然农法生产导览,引导并教授游客如何进行小规模的自然农法实践。

### 3.2 村民致富路径

#### 3.2.1 大山村村民经济收入增加:外出劳动力回流与本地就业率提升

大山村在迎合符号生产,实现农业升级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部分年轻村民捕捉到家乡发展背后的机遇,依赖农业旅游带来的客流贩卖特色农产品,并开始经营个体农家乐,由此大山村也迎来了年轻劳动力的返乡潮。然而大部分的本土村民由于观念、文化和价值观等差异悬殊,不同于年轻村民,无法准确把握现代消费的需求,但是资本介入大山村建设的过程中同样为其创造了合适的工作岗位:一方面外来资本需要熟悉当地文化的本土村民来演绎富含纯正乡土要素的场景以满足游客进村寻觅乡愁的需求,如坐在村口纺织虎头鞋的老婆婆、沿街开场制作老街糕点的一家人、还有身着蓝布碎花衫的采茶姑娘等,另一方面慢城的一些基本职能,如清洁、安保等,也需要一些廉价劳动力进行维持。

#### 3.2.2 陈庄村民劳动技能培训:从被动求助到主动有为

陈庄35%的村民外出务工,且缺少

类似“国际慢城”等刺激劳动力回流的增长极,因此陈庄的建设只能依靠地方留守的劳动力,而留守村民老龄化严重,且受教育程度低,要依托其开展现代化的乡村营建工作,首当其冲的是解决知识技能不足的问题。入户调研发现,村民对于乡村改造的参与积极性较强,超过85%的村民表示“愿意配合”接受培训、进行房屋改造、垃圾分类等基础性工作,同时,由营建团队组织的“有机堆肥”、“生态农法”等教育课程的参与度高达70%。通过数年的乡村教育,村民的劳动技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可以进行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经营等活动,甚至有个别村民协助中科院团队进行气象数据记录、村庄水质监测记录等工作。

在实践过程中,村民逐渐培养出乡建主体意识,从“坐、等、要”的被动求助中逐渐转向“自己当家作主”的主动有为。然而乡村居民依然存在追求个体利益而忽视村集体利益的短视,村民大会上,某位大爷提出团队入驻影响了其异地搬迁的诉求;部分外出务工村民年节返乡时投诉规划团队历时三年也没有改善村庄居住环境,还阻碍了村庄的搬迁,由此可见,培养村民主体意识和劳动技能的同时,需要建立村民个体行为规范,凝聚村民利益共同体的共识。

### 3.3 村庄建设路径

#### 3.3.1 消费文化主导的大山村空间美化

大山村村庄建设目的主要是吸引城市游客发展乡村旅游,因此城市游客的消费文化成为大山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是回归传统的、原真的、田园牧歌的物质空间环境,以满足游客逃离城市,体验乡愁的诉求,为此大山村首先开展了祠堂、村口等记忆性空间修复,坡屋顶、白墙黑瓦等乡土要素强化。其次还要考虑游客城市化的消费习惯——现代、便捷、舒适。由此,硬质广场、停车设施、健身绿道等基础设施陆续开始配建以满足游客的消费文化需求。

然而过于关注游客需求也导致了大山村乡建的问题。原先亟待解决的乡村

表1 陈庄村村民诉求排序表

Tab.1 Appeal list in Chenzhuang village

诉求排序	类型	具体诉求
1	给水设施	希望通上稳定的自来水
2	道路	通往县城的路需要硬化
3	垃圾处理	垃圾房又脏又臭需拆迁
4	水系	池塘很脏,需要净化
5	厕所与农用肥	改厕需保留农家肥
6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设施无法使用
7	建筑	老房子要拆掉重建
8	产业	蔬菜储存难,苗木无销路
9	交通	希望早晚有趟进城公交车
10	广场	需要一个公共活动场所
11	沟渠	沟渠要保留并拓宽,防洪
12	照明	村里晚上太黑,需要照明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陈雯的研究改绘。

基础设施被边缘化,至今没有稳定的给水系统,排污系统也随着游客增加而愈发不堪重负,乡村物质空间供需明显错位。此外,后续逐渐建成的农家乐、纪念品商店,组织开展的真人CS、音乐演出和篝火晚会等都彰显着城市的消费文化,冲击原有的乡土文化,引起从空间到文化的异化。

#### 3.3.2 科技创新推动的陈庄功能改善

陈庄同中国大部分衰败乡村一样,上级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建设经费需要有针对性地投放到村民诉求最急迫的项目中。通过全覆盖的入户调查,对村民诉求进行排序(表1)<sup>⑦</sup>。以给排水设施建设为例,在区域供水和就地钻井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以茅山新坝水塘为饮用水源地,规划团队引进乡村小规模供水设备,茅山管委会负责施工与管网建设,解决陈庄多年供水不稳定的困扰;由于陈庄地处水源涵养区,村庄排水受到极大限制,在村落集中区应用真空源分离黑水技术以及轻灰水收集处置技术,北部散户建设生态厕所,以此保证出村水质。

陈庄乡村空间营建过程中,合计召开了四次村民大会,规划师与村民充分交流,讨论村庄是否搬迁、规划、发展方向、通勤需求、旧屋改建流程等事宜,并培养村民对于集体事务的议事规范和落实制度,为后续的村民自主决策事务奠定制度基础。



### 3.4 复兴还是异化？传承还是内卷？两村的后续观察

大山村政企合作模式依托符号嵌入，快速实现农业转型、村民致富、乡村发展的目标，但同时产生了一系列异化的问题：村民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产业存在明显的依附现象、村庄建设流于外观的美化。后续调研发现，随着社会热度逐渐下降，游客减少、企业撤资，大山村重新表现出破落的情景，崭新的农家乐贴上了房屋转让的告示，原本朴素的村民开始坐等新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投入。权力下放造成村庄收入分化，而乡村景观分异又实质阻隔了弱势群体改善生活的渠道，（高慧智，等，2014）喧闹过后，大山村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出现了异化，新的治理问题随之而来。

反观陈庄的社区自治模式，乡村空间环境变化不大，但各项基础设施基本能满足村民所有的日常生活需求，并保留下了完整的村落肌理和乡土建筑。目前陈庄村民已经开始自发进行事务决策，小规模农产品加工销售和知识相互学习与教授，为陈庄乡土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可能性。然而高额人力和财政投入的乡村社区营建中，村民的小农思想依然需要不断引导，年轻的劳动力依然没有回流，乡村的物质空间依然失序，新治理体系与乡村发展之间如何协同成为又一重要命题。

##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述两个典型实证案例的对比研究，资本下乡和精英下乡会造就结构迥异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而产生乡村发展路径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乡村产业结构、村民劳动力素质和村庄空间环境。两种模式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表2），均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谱系中的探索实践。资本下乡的政企合作模式能让乡村快速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弱势地位，但存在明显的乡村异化的现象，以及空间老化与市场变迁下的乡村衰退风险；精英下乡的社区自治模式保留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底蕴和空间肌理但要实现乡村经济发展要投入大

表2 两种要素下乡的辨析

Tab.2 Comparison of two rural governance models

城市要素	资本要素下乡	精英要素下乡
研究案例	高淳大山村	句容陈庄
治理模式	政企合作	社区自治
发展动因	资本积累、符号生产	教育赋权
价值导向	激活乡村空间资产属性，纳入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体系	培养村民主体意识
乡村治理主体	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城市游客	乡镇政府——本土村民——社会精英
乡村发展路径	产业转型路径	依托嵌入符号的消费属性，结合第三产业发展景观、生态等非农化农业
	村民发展路径	依附资本溢出效应开展商业经营或者提供基础性服务
	村庄建设路径	构建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并保留乡土的空间形象
遗留问题	村民外部依赖性严重，村庄空间异化，乡土文化消解，市场竞争与激变的市场需求，缺乏可持续性	乡村振兴的时间成本上升，短期难有回报；村民自私意识需要不断引导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量的时间成本。当前中国东中西不均衡的区域格局和市乡镇科层式的行政体制决定了难以沿袭单一模式开展城市要素下乡实践，个别乡村借鉴大山村引入资本下乡快速突破现代经济要素的桎梏，成为区域性乡村增长极；多数乡村学习陈庄号召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下乡，催化乡村内在结构优化、形成乡村振兴的持续内生动力。这种点面结合、人钱并行、兴衰共存的乡村治理格局可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猜想。

回溯两种模式的遗留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内涵，粗放地用“城治”来塑造“村治”，以“利润至上”来剥夺“自主选择”，是“城市性”（urbanism）对于“乡土性”（ruralism）的清理，而非乡村的本质振兴。乡村实质是人的一种聚落形式，村民主体的振兴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而扭转村民“靠欲望行事”的意识衰败比扭转乡村社会经济等的指标衰败更加艰难也更具意义。

感谢中科院南京地湖所陈雯研究员对本文的启发与帮助。

### 注释

- ① 中央一号文件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998976.html>；中央一号文件鼓励“资本下乡”：<http://news.163.com/14/0310/15/8NOE7LHI00014JB5.html>
- ②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

文：<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8886>

- ③ 根据《国际慢城宪章》，候选城市需符合慢城的55条准则：<http://www.cittaslow.org/>
- ④ 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团体利益同分，责任与成本却由团体的每个成员承担，这样便会出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与行为。
- ⑤ 温铁军认为农业生产力领域中的基本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三要素流出农村的现象，这也是三农问题从此变得严重的内因。详见：<http://www.china-esc.org.cn/c/2013-01-14/603510.shtml>
- ⑥ 自然农法(Natural Farming)又叫自然农耕：依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维护土壤生机的土壤培育为基础，绝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农药和各种生长调节剂以及任何有残害土壤的添加物。是国际上有机农业体系之一，由日本人冈田茂吉于1935年开始提倡。
- ⑦ 2017年10月17日，陈雯研究员应邀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特色田园：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专题研讨会，并介绍了她在陈庄的相关研究，展示了陈庄营建初期村民需求调研的结果。

### 参考文献 (Reference)

- [1] 陈锋.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 社会, 2015, 35(3): 95-120. (CHEN Feng. The hierarchy of profit divis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volution: the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ource input[J]. Chinese

-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5, 35(3): 95-120.)
- [2] 党国英. 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12): 1-17. (DANG Guoyi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reform[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8(12): 1-17.)
- [3] 范凌云.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6): 106-113. (FAN Lingyun. Evolution and reflection on rural planning of city-cluster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Suzhou[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6): 106-113.)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5] 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 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1): 68-73. (GAO Huizhi, ZHANG Jingxiang, LUO Zhendong. Renaissance or alienatio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ce of metropolis fringe area driven by consumer culture: empirical observation on Dashan village of Gaochun International Slow Cit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1): 68-73.)
- [6] 何建华, 于建嵘. 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5(3): 32-39. (HE Jianhua, YU Jianrong. Summary of research on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cent twenty years[J]. 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2005(3): 32-39.)
- [7] 贺雪峰, 董磊明. 中国乡村治理: 结构与类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3): 42-50. (HE Xuefeng, Dong Leiming.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tructure and type[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05(3): 42-50.)
- [8] 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1): 219-224. (HE Xuefeng. Three major themes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5(1): 219-224.)
- [9]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HE Xuefeng. New rural China[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 黄博, 刘祖云.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精英治理现象探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3): 86-90. (HUANG Bo, LIU Zuyun. Analysis of village elite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llagers' autonomy[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13(3): 86-90.)
- [11] 焦长权, 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 100-116+205-206. (JIAO Changquan, ZHOU Feizhou.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6(1): 100-116+205-206.)
- [12] 金太军.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00(4): 61-64. (JING Taijun.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under the pattern of "countryside village governance"—analysis on the restri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committees[J]. Socialism Studies, 2000(4): 61-64.)
- [13] 邹艳丽. 我国乡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5, 39(6): 59-68. (GUI Yanli. Research on basic models of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n Houxinglongdi village in Balin left banner[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6): 59-68.)
- [14] 刘金海.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J]. 中国农村观察, 2016(6): 67-74+97. (LIU Jinhai.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l[J]. China Rural Survey, 2016(6): 67-74+97.)
- [15] 乔杰, 洪亮平.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 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4): 81-89. (QIAO Jie, HONG Liangping. From "guanxi" to "social capital": the predicament of and prospect for planning theory in rural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4): 81-89.)
- [16] 施雪华, 林畅.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8(2): 1-4. (SHI Xuehua, LIN Chang.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8(2): 1-4.)
- [17] SMITH N.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4): 538-548.
- [18] The UN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 王曙光. 城乡一体化要双向要素流动和两个下乡[N]. 中国经济时报, 2016-06-17(009). (WANG Shugua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quires two-way elemental flow and two rural areas[N]. China Economic Times, 2016-06-17(009).)
- [20] 温铁军. 产业资本与乡村建设[J]. 开放时代, 2005(6): 11-18. (WEN Tieju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rural construction[J]. Open Times, 2005(6): 11-18.)
- [21] 武前波, 俞霞颖, 陈前虎. 新时期浙江省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政策供给[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0): 76-86. (WU Qianbo, YU Xiayin, CHEN Qianhu.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rural area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21st centur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0): 76-86.)
- [22] 吴祖泉. 建设主体视角的乡村建设思考[J]. 城市规划, 2015, 39(11): 85-91. (WU Zuquan. Thoughts on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subject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11): 85-91.)
- [23] 徐勇. 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XU Yong. Rural governance and Chinese politic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 [24] 于涛, 张京祥, 罗小龙. 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 研究进展及思考[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 18(2): 94-100. (YU Tao, ZHANG Jingxiang, LUO Xiaolong.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thinking on the spatial effects of city marketing by mega-event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18(2): 94-100.)
- [25]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超越线性转型的乡村复兴——基于南京市高淳区两个典型村庄的比较[J]. 经济地理, 2015, 35(3): 1-8.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naissance that beyond linear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ypical villages in Gaochun, Nanji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3): 1-8.)
- [26]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复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1-7.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naissance: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5): 1-7.)
- [27] 张尚武, 李京生, 郭继青, 等. 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J]. 城市规划, 2014, 38(11): 23-28. (ZHANG Shangwu, LI Jingsheng, GUO Jiqing, et al. Rural planning and rural governa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11): 23-28.)
- [28] 邹说.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ZOU Da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history and micro action[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修回: 2019-10